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浙江精神的演进^{*1}

廖芳玲 万斌^{*2}

【提要】浙江精神是被全省人民所拥有和认同的、能够催人奋进的、具有浙江地方特色的群体意识、精神状态、价值取向和思想境界的理论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亲自发起和主持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大研讨和提炼活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浙江精神的演进主要表现在：从自发性质到自觉性质的努力提升、从浙东局部到全省范围的整体融合、从实然状态到应然状态的全面拓展等三个方面。浙江精神是对浙江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各地人文精神的提炼和总结，是涵盖了全省范围的“多重合奏”，是一种总体性判断与诠释。浙江精神既是对过去至今的描述和概括，更是对明天的引领和激励，支撑我们在未来的实践中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与时俱进。

【关键词】：与时俱进 浙江精神 改革开放四十年

浙江精神是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是与我国市场经济内生要求相匹配的深层精神支柱。所谓浙江精神，是一种被全省人民所拥有和认同的、能够催人奋进的、具有浙江地方特色的群体意识、精神状态、价值取向和思想境界的理论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高度重视浙江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亲自发起和主持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大研讨和提炼活动。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期间，又对浙江提出了“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要求，充分体现了大力秉持和弘扬浙江精神的重要性。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反思和追问的是，浙江精神的发展逻辑是什么？根源或动力何在？如何才能充分发挥“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引领作用？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浙江精神演进过程的再审视。

一、从自发性质到自觉性质的努力提升

浙江精神是浙江经济腾飞的历史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具有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有土壤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内在特质。从发生学的角度观之，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浙江精神可以说发端于史前文明，一代又一代的浙江儿女辛勤劳作、艰苦创业，在创造巨大物质文明和财富的同时，也使浙江精神不断地发扬光大，世代相传，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之前的“浙江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尚属于一种自发性质的形态，即它是以那种潜流于浙江民间的风俗形式而呈现出来精神形态。风俗，即风气习俗，都具有自生自发的特性。浙江民间风俗是指浙江老百姓在实际生活中所体现出的一种自发的、不系统的、不定型的社会文化心理。虽然，它们是不自觉地形成的，但其作用可不容小觑，却往往成了浙江老百姓要自觉维护的范式。正如民俗学家萨姆纳所说，“民俗是一股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主宰了社会生活，“所有成员都被迫遵从”，“人类的全部生活，包括所有时代和文化的各个阶段，主要受大量民俗的主宰”。^①可见，就这个意义上说，浙江民间风俗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更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但此时，以浙江民间风俗形式呈现出来浙江精神形态，还属于浙江的“草根精神”，也表明实践主体——浙江人尚未达到文化自觉的状态。

文化发展是需要自我反思和比较的。只有在不断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不断地“脱域”，即脱离“自发”状态和场景而具有“自觉”状态和场景的过程，不断地摆脱“自发”状态对人的文化束缚和约束状态，进入普遍“自觉”状态。要做到对浙江文化和浙江精神的自觉，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对自己文化的灵魂有深刻的认识，也就是

¹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3JDT02YB)阶段性成果。

² 作者廖芳玲，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科技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讲师；杭州 310023 万斌，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28

对浙江文化之魂的“浙江精神”要有科学准确的概括和提炼，特别是要根据推进浙江发展新实践的需要，实现浙江精神的与时俱进；二是要对浙江精神的地位、功能和作用等有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要充分重视和发挥“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巨大功能和作用。

关于第一个条件，浙江人自己对浙江文化之魂的“浙江精神”的概括和提炼。1999年12月，在浙江省社联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同志首次提出了“提炼浙江精神，总结浙江经验，开拓浙江未来”的重要任务，由此启动了浙江社科界、文化界等对“浙江精神”的率先研究。2000年7月，浙江省委十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大力实施调研的基础上对“浙江精神”进行了初步提炼，形成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十六字的表述语。毫无疑问，这是浙江人基于民间风俗形式的浙江精神形态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良好开端。2005年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深入研究浙江现象、充实完善浙江经验、丰富发展浙江精神”和“浙江精神的调研应从浙江文化的历史传承、社会精神文明、文化综合实力的作用等诸角度进行”的重要批示，亲自确定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研究的方向和基本框架，并修改和审定研究报告。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大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总结和提炼，基本达成共识：一方面，浙江精神的原“十六字”表述语，较好地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在传承浙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努力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它历经多年的实践培育并检验，已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因而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随着世情、国情和省情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之后，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浙江精神”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随之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因而“浙江精神”的内涵迫切需要得到与时俱进地充实。毫无疑问，后续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概念以及“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②十二字表述语的阐扬，是浙江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体现，意味着对“浙江精神”的认识已提升到了自觉状态。

关于第二个条件，浙江人自己对浙江精神的地位、功能和作用等的深刻认识。客观地说，浙江是我国最早意识到区域文化精神对发展地方经济社会的重要性、最早把区域文化精神即“浙江精神”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因和精神支撑的省份之一。综观之，浙江文化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到文化浙江建设的实际演进过程，经历的一个个阶段，都是对文化地位、功能和作用等认识上的一次次飞跃、一次次提升。如今浙江人已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浙江文化建设只有在充分发挥对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自身治理的功能和作用中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收到实效。实践经验证明，要实现对浙江精神的文化自觉，并充分发挥浙江精神的作用，就需要做到“三个有机结合”，即中华民族精神与浙江精神的有机结合；浙江基本文化基因与当代先进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浙江文化建设的当下任务与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能否实现这三个有机结合，是检验浙江文化建设自觉程度的重要指标。

可见，正是在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学者以及广大民众的积极推动和参与下，“浙江精神”才得以一次次地提炼和升华，才能以浙江人的自觉精神形态得以呈现。可以说，浙江精神的形成并得以充分展示和发扬，得以准确阐释和提炼，得以不断丰富和升华，也离不开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学者以及广大民众的主观努力与积极作用。

二、从浙东局部到全省范围的整体融合

浙江精神的概念，理应是客观、全面地兼顾或综合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浙江全境而提出来的，是对浙江各地域人文精神的提炼和总结，只有这样，才更令人信服和认同。也就是说，浙江精神是以呈现出来的浙江各地市的地域人文精神为基础的，是具有浙江各地市广泛的人文精神的支撑的，充分体现了浙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精神要素的提炼和概括。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最初提出和阐释的“浙江精神”(原初版本十六字)，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侧重于对浙东区域的人文精神的概括，而较少涉及浙西区域。浙江省自古就有“两浙”之称，即分为浙东与浙西。本文采用“大浙东”的地域概念，即旧志所称的“上八府”：宁波府、绍兴府、温州府、台州府、处州(今丽水)府、金华府、衢州府、严州(今建德)府，与浙西的“下三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相对应。^③浙东与浙西，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和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历来的农业发展方式的差异，生于斯长于斯人们的生活和实践的不同，造成了该区域人文精神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差异，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个性、风格与优势。浙东的温台、宁绍和金衢等区域，人地矛盾十分紧张，生存压力很大。浙东区域的人文精神有一种开拓解放、豪

迈大气、狂飙突进的气质，强调个性、个体、能力，而且特别看重经世致用。例如，温州老板（个体民营企业群体）异军突起，名扬全国，概括出“四千精神”、“两板精神”等家喻户晓，尤为典范。原初版本的浙江精神（十六字），即“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主要是以改革开放初期走在前列的浙东的温台、宁绍和金衢等区域形成的“温台精神”、“宁波精神”、“绍兴精神”、“义乌精神”等为重要蓝本的。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迫切需要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开拓和引领。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高度重视总结和提炼新时期的浙江精神。浙江省有关部门多次召开“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座谈研讨会，组成调研组深入浙东与浙西各地，认真听取了所在地专家学者、基层领导和普通群众对丰富发展浙江精神的意见和各地概括提炼区域精神的情况。2006年，经过反复的讨论和研究，最后浙江省委确定“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十二字）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这就在坚持和弘扬浙东区域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吸纳了浙西杭嘉湖地区自古以来就对“诚信”、“和谐”等生活理想格外重视和矢志追求的传统因子，以及体现了杭州毗邻上海国际性大都市的区位优势而形成的“开放”等人文精神要素。

历史上，物产富庶、农业相对发达、小商品生产历史悠久、生存压力较小的浙西杭嘉湖区域的人文精神，一直秉持着传统深厚、精巧纤细、温柔敦厚，强调集体、等级、诚信、和谐，重格物致知等特征，至今仍影响深远。就拿“诚信”而言，它一直是浙西杭嘉湖等区域商业文化繁盛的基石。例如，百年老店杭州胡庆余堂的中药文化，自胡雪岩作为第一代掌门人定下了以“戒欺”为店规以来，胡庆余堂的后人们就一直以诚信的态度对待业界和顾客，获得了公众的极大信任和赞誉，由此药店生意保持长盛不衰；一直到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青春宝集团的创始人冯根生，仍把当年的“戒欺”二字当成了经商的《圣经》，从来就讲诚信，不骗人。就“和谐”而言，浙西杭嘉湖等区域千百年来崇尚一种整体“和谐”的传统和境界。又如，明清时期杭嘉湖一带的商业行会，“以迎神祭祀和举办救济事业”，发扬互助互济，“来阻止行内分裂，维护同行成员的团结”，虽然商业行会“用平均主义方法，来制定各种条规，阻止竞争”，但是，由于“行会制定了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各种规章制度”，^④客观上也培养起同行成员间的协调性或规约性道德，为创造一个和谐的商业环境做了不少努力和贡献。再如，这种整体和谐的人文精神，也体现在杭嘉湖一带的城乡园林的建筑布局、景观和风格之中，尤其是杭州的西湖景观及周围古建筑群的文化布局中。而由于地理优势，明清时期杭嘉湖一带市镇经济十分发达，老百姓生活条件相对较好，而使人们在劳作之余的娱乐休闲功能有了发挥的余地 and 可能，这就为浙西的文学艺术包括词、曲、小说、戏曲、音乐、书画、篆刻、雕塑等领域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得浙西在浙江文学艺术发展中处于领先并占主导地位。这也是导致浙东与浙西在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上具有微妙区别的深层原因。

可见，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之“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十二字表述语，既保留了浙东区域（温台、宁绍、金衢等先发区域）人文精神的鲜活个性，又合理吸纳和整合了浙西杭嘉湖区域人文精神的精髓，因而已不再是一种对浙东区域有选择性的理论概括，而是涵盖了全省范围的“多重合奏”，是对浙江精神的总体性判断与诠释。

三、从实然状态到应然状态的全面拓展

从发展趋势来看，浙江精神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的核心或灵魂，既是对浙江过去至今的群体意识、精神状态、价值取向和思想境界的描述和概括，更是对明天的引领和激励，支撑我们在未来的实践中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与时俱进。但是，我们也发现，最初提出和阐释的“浙江精神”（原初版本十六字），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侧重于对浙江那种深藏于民间的群体无意识或基层民众活力以及浙江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时期的创业意识的概括，而较少涉及浙江人适应市场经济转型需要而形成的价值取向，以及浙江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初创时期到趋于完善时期做出的自我诊断意识和价值观重塑追求。因此，浙江精神的发展就需要完成从实然状态到应然状态的全面拓展。浙江精神的实然状态，是指浙江精神与浙江区域文化实际情态的一致性、契合性，使其集中体现地方特色的文化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较快地走向繁荣和富强，浙江精神作为一种重要价值理念的引领作用功不可没。正因为如此，浙江精神才能被当今的浙江人民大众所广泛认同和接受。浙江精神的应然状态，是指浙江精神与浙江区域经济、社会现实和未来的关联性、适应性，使其足以引领浙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正因为如此，浙江精神才能指引未来，促使人们树立远大目标和美好生活愿景，成为引导人们成功地进行新的

价值追求和价值创造的强大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进入新时代的浙江发展，仍然需要大力秉持和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一) 求真:从自发摸索到自觉认识、遵循和运用规律

浙江历史上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生活实践中都有着深厚的“求真”传统。但是，由于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循，而靠自发摸索，因而浙江人在成长之路上也付出过诸多沉重的代价。例如，浙江人的早期创业行为大多出于比较狭隘小农经济基础和草民意识，主要是基于生存欲望，而不是在实现自我价值，主要是基于生活经验，而不是在科学知识基础上推进创业活动。因而，在这些浙江人身上就明显存在着对学理论、懂规律、尚(爱)科学缺乏兴趣和动力的现象。因此，浙江人当务之急是面临着如何由自发摸索状态上升为自觉“求真”状态。所谓求真，就是追求真理、遵循规律、崇尚科学。十分重要的是要做到思维方式的提升:从经验思维上升到理论思维。经验思维的局限性表明，它不能达到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深刻认识，而只是直观的、非整体的、非系统的、浅层次的认识。理论思维的长处，是能够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及本质联系，从而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理论思维这种人所特有的素质和能力，不是天生固有的，也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必须通过后天社会实践才能逐渐培养起来的。

(二) 务实:超越“务一己或小团体之实”走向“务天下国家之实”

浙江人的务实精神和务实传统，早已铭刻在头脑中，融入在血液里，落实在行为上。但是，由于在一些浙江人眼中，“实”就是“利”，“务实”实际上就是谋利，并且容易理解作谋一己或一家、一村、一厂等小团体之利，也就是解决一己或一家、一村、一厂等小团体的生存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经济是老板经济，传统产业尤其是轻纺和日用小商品工业等，其经商创业和管理一般由老板个人或家庭就能独立进行。浙江人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然后是相互追赶。虽然，在市场经济的初创时期，这也是谋取出路和为了生计的力量，而且众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逐利行为也能形成一种自发群体性的创业合力。但毕竟这种务实的境界还有待于提升为自觉地谋求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乃至人类共同利益。可是许多浙江人心里早已习惯于狭隘的眼界:一方面把谋求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乃至人类共同利益的任务交给政府，似乎与己无关;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对谋一己或一家、一村、一厂等小团体之利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多行方便。此外，如何使务实的浙江人自觉地认同共享理念，实现从财富增长到财富共享的局面，也是任重道远。所谓务实，就是要尊重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浙江人要实现超越“务一己或小团体之实”走向“务天下国家之实”的转变，对自我中心主义的遏制和克服是关键。因为自我中心主义的张扬必然极易导致个人对社会应负之义务和责任的忽视，以及共享理念的淡薄。自我中心主义的张扬，是浙江的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要遏制和克服之，殊为不易。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培养个体超越单纯的、具体的、分散的功利追求，而把对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乃至人类共同利益作为最高追求。当今，浙江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布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等的主要起点和重要枢纽，更应“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语)。因此，浙江人要有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大手笔，突破小家子气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培植起“务天下国家之实”的心胸和全球化的经营理念，很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中去竞争、合作和发展，努力成为一个具有家国情怀和较高文明素质的世界公民，关心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共同发展。

(三) 诚信:从个体道德良知到现代信用体系建设

在浙江商业文明史上，诚信一直是浙江人引以为耀的最耀眼的一抹底色。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浙江一直以来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导，以成长于传统小农经济中的个体手工业“草根经济”为特色，特别是浙江农民的早期创业活动大多是以“熟人社会”或人缘关系为基础而市场信用体系并不完善的条件下展开的，在相当范围和程度上奉行的是特殊主义信任模式而不是普遍主义信任模式，^⑤经济活动大多具有“人格化交易”的特点，依赖着以血缘、地缘及同窗、同事乃至战友之缘所编织成的巨大关系网来运作，^⑥这种商业文化与现代市场伦理必然存在着突出的矛盾和冲突，因而极易造成大量的缺少诚信和无信现象。

而且，由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法制还不够健全、舆论监督体制还不够发达的当代社会环境之下，许多人的缺少诚信和无信现象也可能会逃脱法律惩罚或道德谴责，使得不讲诚信的人屡教不改，有恃无恐。进入新时代，浙江人不仅要弘扬传统的诚信美德，更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现代诚信意识，把诚信作为公民安身立命之本，作为现代社会文明之基。所谓“诚信”，就是重规则、守契约、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要大力推进以个人为基础、企业为重点、政府为关键的现代“信用”建设。实现从个体道德良知到现代信用体系建设的转变，在价值观上必须摒弃浙江人功利化思想比较盛行的陋习和缺陷，不应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不择手段，防止贪图蝇头小利，陷入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泥坑。

(四) 和谐:从张扬个性到注重整体协调发展

和谐幸福，一直是浙江人民孜孜追求的美好生活理想。但是，由于浙江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曾发挥过巨大积极作用的敢为人先、勇于突破、注重效率、张扬个性的作风和习惯的深远影响，难免给一些不和谐现象留下了余地。例如，在浙江人眼里，敢于“破”计划经济的藩篱是最值得称赞的事，因而才会不断有人敢于出来向旧体制叫板，但善于“立”却不是大多数浙江人的强项，以至于有的学者把浙江文化说成是一种“破大于立”的文化，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浙江人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正是依靠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才抓住了一个个难得机会，创造了一个个伟大奇迹，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但是，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规章制度基本已经建立起来，需要人们去切实遵循和落实，再光凭早期那种敢闯敢干精神来办事已远远不够。关键是如何能把很多事情从“可能”变成为“合理”或“和谐”状态，如何能把张扬个性和强调竞争引向更高层次的注重整体协调和谐发展的要求。又如，在浙江人眼里，财富增长是最大的事，只要能使财富增长，就什么事都能干，有时就会导致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不仅如此，如果只重视财富增长而忽视了财富分享或财富共享，这种理念也是不利于和谐局面的创造的。因此，进入新时代，浙江人要把和谐精神、和谐人际关系作为今天弘扬浙江精神的重要内容。所谓“和谐”，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浙江人十分重要的是要树立起正确的效率与公平价值观，既重视效率的提高，更要把公平和谐作为浙江人奋斗的理想目标之一。公平才能凝聚力量，和谐才能成就伟业。

(五) 开放:从被动模仿到自主创新

浙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具有大胆吸纳异质文化的开放精神。但是，毋庸讳言，浙江人在对外开放中是存在薄弱之处的，这就是被动模仿有余而自主创新不足。显然，浙江的经济发展已到了不能再依赖单纯的低端商品输出阶段，而是需要仰仗高端商品和要素输出与流入双向加速并不断融合的新阶段了，也就是说，已到了开始依靠自主创新来登台唱主角的时候了，可是一些浙江人的自主创新观念仍然相对缺乏，落实和推广自主创新十分艰难。例如，一些浙江民营企业，擅长模仿和模仿创新，缺乏从模仿创新转变为自主创新的能力、经验与动力；囿于家族制管理，缺乏制度和管理上自主创新的追求与动力；疏于企业文化建设，缺乏企业文化上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与动力。这些不足之处，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浙江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此外，在浙江改革开放的初期，更多地青睐和落实“引进来”，即引进资金、技术、人才、资源、装备、管理、劳动力等等，是当时浙江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不失为一种较佳选择，但是随着浙江自身发展实力的增强和开放水平的提升，更多地依赖和落实“走出去”，就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和必然选择。因此，浙江人弘扬开放精神，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和提高自主创新水平的必然要求。所谓“开放”，就是全球意识、世界胸襟，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关键在于要在体制与心灵这两方面都更加开放。首先，要促使浙江人主动融入世界，融入全球，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高度的站位去谋划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开放理念作为存在和发展的大布局，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和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始终与外界保持常态的全方位交流。在整合资源中携手共进，在竞争合作中做强做优。其次，要促使浙江人要进一步树立开放意识，积极参与全球化合作与竞争，使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精神素质不断适应开放的世界和全球化竞争的需要。

(六) 图强:超越“小富即安”心态而永葆“富而思进”精神

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奋发图强是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以来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浙江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图强精神，迈过了一道道难关，成就了创业创新的伟业。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从事自发性创业的浙江人，其身份主要来自农民和具有“草根性”，也就是说，他们自发性创业的动机或动力主要是为了生存温饱欲望的满足，一旦他们摆脱了贫困或者富裕起来之后，有时就会出现“小富即安”、“小进即满”心态，当初的创业冲动和创业精神都消失了，变得目光短浅，心胸狭隘，谨小慎微，不愿再拼搏奋斗“二次创业”。一些浙江民营企业家囿于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不思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融入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而大有作为、大展宏图。因此，进入新时代，浙江人应与时俱进地弘扬图强精神，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和更美好生活的憧憬，所谓“图强”，就是勇于拼搏、奔竞不息，就是奋发进取、走在前列。实现从小富即安到富而思进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要摒弃“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是农民在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落后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意识，表现为民间普遍存在的小富即安、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等心理状态。其实，就个体而言，安于现状，过小日子足矣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如果多数人都以这种选择为取向，则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虽然，小农意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造和克服，但在一些浙江人身上仍较为严重，影响了富而思进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富而思进的“进”，是进取、进步、奋进、先进，是“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激流勇进。改革无禁区，创新无预设，图强无止境。只有富而思进，进入新时代的浙江人民，才能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跑道上奋进，早日实现“两个高水平”的奋斗目标。

一张蓝图绘到底。浙江 2018 年新推出的“关于文化浙江建设的推进意见”，本质上也是“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进一步延伸。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浙江精神的演进，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单元，必将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展望未来，“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将会给浙江和中国的发展继续带去更绵延无尽的力量。

注释：

①转引自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96 页。

②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日报》2006 年 2 月 5 日。

③参见曹屯裕主编：《浙东文化概论》，宁波出版社，1997 年，第 5 页。

④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435 页。

⑤参见陈立旭：《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变迁》，《当代社科视野》2009 年第 10 期，第 5-11 页。

⑥卓勇良：《当代浙江精神及浙江人的局限》，《浙江经济》2012 年第 15 期，第 57 页。